

将相枉死百案

韩 雷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前 言

西方人曾慨叹过，东方，尤其是中国，是官僚们的天堂。然而，官场对步入仕途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一座地狱。

中国古代的黎民百姓性命如草芥，这早成定论，但身处上层社会的将相大臣们，性命也并不怎么值钱。改朝换代之际，暴君当政之时，总要有一大批臣子为皇权而牺牲。这暂且不提，就拿太平时期被加上罪名杀掉的大臣来说，又有多少是名副其实的呢？翻开洋洋三千余卷的《二十四史》，“死非其罪，天下冤之”、“今犹冤之”之类的话，触目皆是，可见被冤杀者之多。况且像西汉的“巫蛊之祸”、东汉的“党锢之狱”、明代的“蓝党”、“胡党”、“东林党”几次大狱，枉死的将相大臣多得连史官都懒得为他们写上一笔“死非其罪”。中国的仕途太险恶，以至于一些明智的读书人不再遵循“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而徜徉于山水之间以自娱；只敢“立言”、“立德”而不敢奢望达到读书人的最高境界与终极目的——“立功”。

中国的冤狱太多，有的甚至连“冤狱”都称不上，只不过因皇帝一时的恼怒或小人的几句谗言，使即使权势重如李斯、郭崇韬者，也只是简简单单地被杀掉。所以人们已不再去理会这多得无法统计的冤死者，而只注目于岳飞、于谦等几个人、几

场冤狱上。

历代的人们对冤狱的理解大多数局限于正邪斗争上面，很少注意它的其他原因。将相大臣的枉死，原因虽很复杂，但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出于皇帝的疑忌。中国是一个“皇权”至上的社会，皇帝是“天之骄子”，是人间通天的代表，有着至高无上的尊严、权力。正由于此，皇位也成为一切权力斗争的焦点，想铤而走险获得它的大有人在，以致皇帝们担心得有些神经过敏。像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出身低贱，靠阴谋与武力打下江山的，所以对从前与自己称兄道弟、对自己知根知底的功臣非常疑忌。刘邦称帝后，很为异姓王侯们对自己称兄道弟而苦恼；而使他更难安心的则是怕韩信、彭越等手握重兵、勇猛善战的人同自己抢天下。于是，便产生了刘邦大规模剿灭功臣、朱元璋借“蓝党”、“胡党”大杀功臣等事，也产生了张良啸傲山水、刘基设计全身的传说。

中国几千年注重“忠”“孝”二字，而忠孝都是为皇权服务的，所以竟形成了“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理论。遇到所谓的“明主”，杀人还要找些理由；如果遇到昏君，连借口都不需要。“伴君如伴虎”一语诚非虚言。

二、官僚内部权力斗争所引起。皇权虽然很大，官僚手中的权力也不小，像王莽、曹操之类且不必说，像东汉的梁冀，唐代的李林甫、杨国忠，宋朝的秦桧、史弥远，明代的严嵩、魏忠贤，都是权势熏天之輩。这些得势的大臣，权力甚至大于皇帝，所以借此废主自立的也有很多。官僚们的斗争也因此而加剧，他们勾心斗角，结帮为党，相互倾轧，大批官僚因此而死。中国的官场斗争十分残酷，失败者通常被贬被杀被灭族。西汉的刘向在《诫子书》中曾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深刻刻

画了官场斗争的残酷与变幻莫测。

宦官斗争中，宦官与外戚、宦官外戚与朝臣的斗争是最为残酷的。宦官和外戚都是与皇帝亲近之人，容易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行事更加毫无顾忌，像两汉、唐、明，都发生过这种大规模争斗，使各王朝元气大伤，甚至导致灭亡。

三、因私仇陷害。古语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历史上的奸佞小人总是有一种不安全感，记小过而忘大恩，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像明代的徐有贞、石亨，他们同于谦不但没有深仇大恨，而且都曾受恩于于谦，然而却因为一点小事而生仇怨，怂恿英宗杀害于谦。

宋代文豪、政治家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其中说“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实际上确实如此。小人与小人也是互相陷害的，他们之间的联系一切都围绕着“利”，如果无“利”，他们还能够结盟去争夺，一旦有“利”，便开始互生仇怨，互相倾轧。

四、正邪之争。中国有句老话叫“邪不压正”，然而这只是从精神上而言。在事实上，倒是“邪”常常压过“正”。虽然历史的大趋势是向进步发展，可进步人物在同邪恶、倒退的势力的斗争中总是遭到降职、流放、被害的噩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岳飞被杀了。

岳飞奋勇抗金，矢志收复失地，保持民族和政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可谓顺应历史潮流了，可历史偏偏同他做对，走了另一条道路。秦桧以“莫须有”三字杀害了岳飞，虽然并没有使南宋立刻灭亡，但南宋也只能称为苟延残喘了。经过一百多年的屈辱，终于灭亡于异族政权。

孔子曾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算是说中了“正邪不两立”的原因，但何以“正”斗不过“邪”呢？

这恐怕得归根于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小人奸佞之所以能够横行不法，主要是依靠皇帝。试观历史上的奸臣，大都是受皇帝宠信之人，他们想尽办法取悦皇帝，自大者进以美言，爱财者献以珍宝，好色者进以美女，黠武者媚以征战。任你皇帝爱好再多，都能有人投之以好。而忠直之士则不同，他们大多不讲策略，唯以“耿直”自期，抗言直谏。像明代“大议礼”一案，百官伏阙谏阻，却没有一个人能对年轻的皇帝喻之以理，导之以情，结果使小人乘机笼络住皇帝。何况“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连贤明如唐太宗也偶尔露出不耐烦。

奸人得势，所为者己；忠臣得势，所为者国，两者必然发生冲突。小人行事无所顾忌，为达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而忠臣之士多忠厚无心机，纵虎归山，反受其害，况且小人又能以皇帝为靠山。

五、受牵连被害。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以之为引来害别人，如宋代的张宪、岳云，明代的曾铣、熊廷弼；第二，事件中受到牵连，如历代几次大狱中“坐某某死”者，大臣的亲属、朋友、部下，都很容易受牵连而死。这种受害者中，多数名气不大，甚至得不到后人的感叹。中国古代的法律极其严酷，战国时秦国的商鞅所实行的一家有罪十家连坐办法，枉杀多少无辜！“灭族”、“灭三族”、“灭九族”，名目繁多，明成祖更发明了“灭十族”，连朋友、学生都要杀。

以上是概括“枉死”的原因，当然并不全面，像死于反间计的人，就不能都列入以上五种原因中。而且许多人兼有数种原因才导致“枉死”，这些原因也都互有联系。比如说小人进谗言，它必定有皇帝疑忌为前提，朱元璋的谋士、也是最了解他的人刘基曾说：“谗不自来，因疑而来；间不自入，乘隙而入。”（《诚意伯文集》）明白地道出了此中奥秘。夫差如果不疑忌伍

子胥，伯嚭的谗言就不会那么起作用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历史上枉死的将相大臣数不胜数，代代皆有。因此本书只取一些典型人物来写，略去死因相同的许多人，另外又在职位上做了一些限制，尽量取影响大、地位高的人来写。这些人在历史舞台上虽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最引人注目。中国古代的“相”的职位屡有变动，难以限定，一些朝代没有宰相一职，而以大学士掌中书省的职能，所以取裁放宽一些。明清实行巡抚、总督制，虽然都由文官担任，却实兼武将之职，而且权力大，地位重要，便也取入。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对历代皇帝的称呼，这里遵从习惯。如刘邦、朱元璋的名字早已为人所熟悉，便直呼其名；像崇祯、雍正、乾隆虽只是年号，但因这些皇帝在位时只用这一个年号，而且历来人们已熟悉年号所代表的皇帝，所以只称年号以代其人；至于其他名字和年号都不很令人熟悉的皇帝，便只称他们的庙号了。

中国历史上的官名职掌屡有变迁，有的官位在某朝为小吏，至另一朝却地位极高；有的官位在某朝为掌实权之位，至另一朝则成为加给遭贬谪大臣的虚衔。甚至在一个朝代中就变化极大，所以注中只注明某人当时职官的地位、职掌。这也是需要说明的一点。

此书从写作之时起，就受到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左云霄先生的极大帮助。如果没有左先生的支持与帮助，此书是难以完成的，在此谨表感谢。

目 录

伯嚭进谗言，夫差怒杀伍子胥.....	1
变法改革，商鞅受诬被杀.....	6
心怀怒气，秦昭王枉杀白起	12
赵高报私仇，秦二世昏庸杀蒙恬	16
争权夺势，赵高构陷李斯	20
免死殉烹，刘邦逼反韩信	26
诛除异己，吕后、刘邦杀彭越	32
刘氏内讧，袁盎借机杀晁错	36
景帝多疑，周亚夫枉死	40
“杯酒责望”，田蚡杀窦婴、灌夫	44
巫蛊之祸，公孙贺、刘屈氂枉死	51
两次受诬，李广利枉死他乡	57
口无遮拦，杨恽惨遭腰斩	61
贪权夺势，梁冀诬陷杀李固	66
触怒梁冀，杜乔枉死狱中	71
心胸狭窄，曹操疑忌杀孔融	74
疑忌成性，曹操枉杀崔琰	79
二将争功，钟会诬杀邓艾	82

二虎相争，贾南风杀杨峻	88
受人利用，司马玮杀卫瓘	92
一石双鸟，贾后铲除司马亮、司马玮	96
疑忌权臣，宋文帝杀檀道济	101
自毁藩篱，北齐痛失斛律光	106
横祸飞来，史万岁被“明主”暴杀	111
拒听逆耳忠言，隋炀帝乱杀高颀	115
铲除旧臣，隋炀帝杀薛道衡	120
功高心窄，刘文静遭枉杀	124
主暗臣奸，长孙无忌德高被害	130
得罪奸臣，魏元忠受贬而死	135
奸相弄权，李林甫因忌杀韦坚	140
细故生仇，王锜诬杀杨慎矜	143
听信谗言，唐玄宗杀高仙芝	147
枉受牵连，边令诚杀封常清	152
审讯“元党”，刘晏遭谗受害	156
小人陷害，唐德宗枉杀杨炎	162
施放暗箭，卢杞巧害颜真卿	167
“甘露之变”，王涯牵连被害	172
朱温多疑，枉杀王重师	176
疑忌功臣，王建枉杀刘知俊	179
避祸得祸，郭崇韬枉死	183
伶官诬陷，庄宗枉杀朱友谦	189
小隙成仇，安重海诬陷杀任圜	193
处世无方，安重海受诬被杀	197
得罪宦官，曹利用被逼身亡	203
和、战之争，秦桧杀害岳飞	206

恃才轻人，宇文虚中枉死·····	213
主昏臣奸，贺胜三代枉死·····	216
施恩不得报，哈麻愤然杀脱脱·····	224
心虚多疑，明成祖杀解缙·····	228
二帝相争，英宗怀恨杀于谦·····	232
英宗复辟，王文无罪枉死·····	237
招抚义军，马中锡受谤身亡·····	241
争当首辅，严嵩诬告除夏言·····	245
严嵩、夏言争权，曾铣无辜受戮·····	250
明世宗泄怒，枉杀杨守谦·····	254
做替罪羊，明世宗怒杀丁汝夔·····	257
君暴臣奸，商大节枉死狱中·····	262
听信诬告，明世宗枉杀张经·····	265
怒斥奸臣，杨继盛受陷于严嵩·····	269
排斥忠良，魏忠贤残杀杨涟·····	274
得罪群奸，左光斗惨死狱中·····	279
恃才使气，熊廷弼受陷于群臣·····	284
刚愎多疑，崇祯枉杀袁崇焕·····	289
皇室争斗，年羹尧枉作牺牲·····	294
求名得祸，乾隆枉杀尹嘉铨·····	300

伯嚭进谗言，夫差怒杀伍子胥

春秋时的伍子胥，父兄死于楚，自己死于吴，都是被谗言所害。

伍员字子胥，楚国人，父名奢，兄名尚。伍氏祖先事楚庄王时能直谏，留下了好名声，所以使后代在楚国很有名。

楚平王时，任伍奢为太傅，让费无忌（《左传》作费无极）为少傅。费无忌想讨好楚平王，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趁给太子娶妇的机会，把美女献于平王，得到平王的宠爱。平王虽然是本国的国君，但总有一天会死去，而太子总有一天会成为国君，费无忌怕太子嗣位后杀自己，便向平王进谗言，而平王也渐渐疏远起太子，让他带兵守边。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费无忌又接着日夜向平王说太子坏话，说太子现在亲自带兵，对外结交诸侯欲作乱。平王召伍奢拷问，伍奢忠于太子，劝平王不要因贼臣谗言而疏骨肉之亲。费无忌自然是不杀太子不甘心，对楚王说，王现在不制住太子，马上就要被太子所害。平王禁不住费无忌的调唆，囚伍奢，派人杀太子，但派去的人反而放太子逃跑了。

费无忌既已达到不让太子继位的目的，就转而要害伍氏一家。他对平王说：“伍氏有二子，很有才能，不杀掉他们将楚

国的忧患。可以用他们的父亲为人质而招他们，不然将为楚患。”平王派人伍奢说：“能让你的两个儿子来，就让你活，不然就死。”伍奢深知两个儿子的性情，回答说：“伍尚为人仁义，招他一定来，伍员为人刚直又遇事下得了手，能成大事，他想来了会一起被抓，一定不会来的。”真是知子莫若父，伍子胥果然逃到宋国投奔到出逃的楚太子那里去了，而伍尚虽知道去也不能全父命，仍不忍不去，并说自己即使不从父死，也无能报仇，所以还是去楚国了，走前告诉伍子胥一定要报杀父之仇。楚平王果然将伍奢父子杀掉。

伍奢父子被小人谗陷而死后，伍子胥替父兄报了仇；而伍子胥又是因同样的原因而死，却没有人能为他报仇了。

伍子胥和太子建辗转于宋国、郑国和晋国，都不能有所作为，太子建更因为晋灭郑而被郑国所杀，伍子胥又匆忙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开始了逃亡，沿途乞讨来到吴国，从此在吴国定居。楚又因费无忌的谗言杀大臣伯州犂、伯郢宛父子，伯郢宛之子伯嚭（音 pǐ 痞）也逃到吴国。伯嚭同伍员本来是同患难的人，但却正是他用谗言害了伍员。

吴王僚十二年（公元前515年），中历4月，公子光趁国内空虚，用伍子胥推荐的专诸（即《左传》之鱄设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这就是后来成为春秋五伯之一的阖庐（即《左传》之阖闾，音 hé lú 何驴）。阖闾即位后，任伍子胥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伯嚭为大夫。又因伍子胥推荐起用军事家孙武，数年之间连败楚、越，伍子胥得到了阖闾的重视，阖闾曾亲自提议为伍子胥报杀父之仇，伍子胥因名份不正而谢绝了。

吴王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楚国放回了被囚数年的蔡国国君。蔡侯发誓，谁攻楚，自己就为谁做先锋。伍子胥见时机已到，便兴兵伐楚，攻破楚国都城，将已死去的楚平王掘棺

鞭尸三百，终于得报父兄之仇。

伍子胥既已报了仇，便一心一意辅佐阖闾的霸主事业。吴军在伍子胥、孙武的带领下，西破楚国，北镇齐晋，南服越国，一时也成了霸主。但是，吴国同越国相邻，在伐越的问题上，伍子胥为吴国着想，同新上台的吴王夫差发生了分歧，竟被伯嚭谗陷而死。

吴王阖闾十三年（公元前502年），吴伐越，阖闾受伤而死，夫差为王，立伯嚭为太宰（执政大臣）。二年后，一举大败越国。越王句（音 gōu 勾）践派人贿赂伯嚭求和，伯嚭为越求情，夫差也动心了，伍子胥阻止说：“越王为人能耐辛苦，现在王不灭他，以后一定会后悔的。”但夫差听从伯嚭的话，放过了句践。

伍子胥得报大仇，破楚国而鞭楚平王尸，没有阖闾倾吴国之力相助是不可能做到的，而阖闾又死于同越作战之时。伍子胥为报阖闾之恩，即使不从吴国的利益考虑，而只为了报个人的恩情，也是要杀句践的，但夫差为满足一时的虚荣之心，又受到了受越国之贿的伯嚭蛊惑，竟置杀父之仇于不顾，反而开始冷落伍子胥。据推测，与伍子胥同时的孙武，大概就是在夫差嗣位时隐退的，而伍子胥却为人刚强梗直，又图报恩，一再地强谏夫差，丝毫没有为自己谋退路，以至未能像孙武那样保全性命。

又过了五年，越国已暗中发展强大，夫差却没有注意到，一味追求战功，听说齐国内乱，便兴师伐齐。伍子胥又谏道：“句践不死，必为吴患，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而王不先灭越反去攻齐，不太错误的吗？”夫差不听，及至伐齐，大胜而归，所以更不把伍子胥看在眼里。

又过了四年，夫差又想伐齐，句践为了迷惑吴国，也率兵相从，并且用大量的宝贝贿赂伯嚭，伯嚭也不停地向夫差讲越

国的好话。这时，伍子胥还是不改老脾气，又向夫差讲了一番伐齐无用，当先灭心腹之患的越国等话。夫差存心报复，便让伍子胥使齐。伍子胥虽已看出了吴必灭于越的结果，但仍不忍心弃吴，便在回吴之前，把儿子留在了齐国，对他说：“我几次谏吴王，吴王不听，我现在已经看到吴国的灭亡了，你同吴一起灭亡没有益处。”于是，只身回到吴国。

伍子胥使齐而把儿子留在“敌国”那里，使一向同他不合的伯嚭有了除掉他的借口，就赶紧向夫差说：“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多疑，他恐怕要成为吴国的大祸。前些时王欲伐齐，伍子胥认为不可，而王却不但伐之而且大胜，伍子胥因其计谋不被用而耻，更加怨恨。而今王又伐齐，伍子胥强谏，找借口来阻挡，暗中希望吴国败以显他的计谋高。如今王亲行，举全国兵力去伐齐，而伍子胥的谏议不被用，因此装病不从，王不可不加防备，这时如果他起事不难。所以我派人暗中监视他。他使齐时竟把他的儿子托付于齐之鲍氏，为人臣子，在国内不得意，就外靠诸侯，常自认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重用，就常心怀怨恨不满之情，愿王早些想办法图之。”

夫差听了这一密报，也同意道：“微子之言，吾亦疑之。”（《史记·伍子胥列传》）可见伯嚭不诬陷伍子胥时，夫差也有了疑心。于是，派人拿离娄剑赐给伍子胥说：“你用这个去死吧。”因为是国君的意思，倒也免了一番定冤案的事，只是简单地让伍子胥自杀了事。伍子胥还不知道这是夫差要杀他，以为只是伯嚭的谗言而已，所以仰天叹道：“谗臣伯嚭要为乱了，王却反过来杀我。我让你父亲成霸主，在你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是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就这样还几乎没立你。你既得立为王，要分吴国之半给我，我想都不敢想要它。但今天你竟听奸臣的话而杀长者。”叹罢，又对舍人说：“一定要在我的墓上种梓树，让

它可以做棺材（谓装夫差的尸体）；把我的眼睛悬在吴东门上以见越寇入而灭吴。”遂自刭死。夫差听到他死前的话后，大怒，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入马革，扔进长江中。据《国语》载，夫差投伍子胥尸体于江，是想不让伍子胥看到什么他想看到的事。但吴国人都怜伍子胥之死，为他在长江岸边立祠，可见伍子胥对吴国的功劳，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伍子胥死于夫差之手，其实他自己也有识人不明的责任。据《吴越春秋》记载，阖闾谋立太子时，拿不定主意，夫差日夜求伍子胥为他说话，伍子胥就劝阖闾立夫差为太子。阖闾知道夫差的缺点，亲口说他“愚而不仁”，而伍子胥却一味夸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所以阖闾到底还是听从他的建议，立夫差为太子。伍子胥推荐专诸推荐孙武，都识人甚明，却看错了夫差，致使自己惨死不算，还让吴国也走向了亡国的道路。后来夫差穷兵黷武，又沉溺酒色，暴虐不仁之名传于诸侯，终于灭于越国，一一符合了伍子胥的预言。越王句践以自己的经验作为教训，灭吴后，夫差虽软语求情，仍被杀。

据《国语》卷十九《吴语》所载，则说伍子胥（《国语》中称申胥）是不忍见“王之亲为越禽（擒）也”而拔剑自杀，不是夫差赐死，此处从《左传》及《史记》的记载。

变法改革，商鞅受诬被杀

中国古代战国时，周室衰落，七国争雄，二百五十多年间，互相争讨攻伐，最后由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封建的统一王朝。秦国之所以能包容宇内，囊括四海，商鞅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商鞅不仅把自己的才智与力量献给了秦国，而且也将生命赔了进去。

商鞅是卫国人，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因他曾被秦封为商邑（今陕西商县东南）之主，史称商鞅，又称商君。

商鞅少时好刑名之学，很有才能，这从他早年任魏时的一段事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曾给魏相公叔痤作中庶子（掌管诸侯、卿大夫之子管理教育的官），公叔痤知道他很有才干，但未来得及推荐，就病重欲死了。魏惠王亲自去探望公叔痤，并问他如果死了自己该怎么办，公叔痤让魏王将国事交给商鞅，但魏惠王只是敷衍了事。公叔痤知道魏惠王不能用商鞅，便在他临走时对他：“王既然不听我的话用鞅，那么一定要杀了他，不可让他出了国境。”魏惠王许诺之后便走了。

公叔痤见魏惠王走了，就把商鞅叫来说：“今天王来问谁可以继我为相，我说你，看王的脸色不以我的话为然。我只好先君后臣，对王说既然不用鞅，当杀之，王已经许诺我了。你快

逃离吧，不然很快就要被捕了。”商鞅说：“既然他不能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我呢？”终于没有离开。

魏惠王离开公叔痤后，对左右的人说：“公叔已病得很厉害了，悲乎，欲让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谬！”然而，不用公孙鞅，对魏惠王才是“悲乎”呢，如果他能听公叔痤的话，中国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说不定得重写了。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下诏求贤，便来到秦国，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商鞅先用帝道和王道来干谒孝公，但孝公并未留意。最后，商鞅对孝公大谈霸业之道，说得孝公很高兴，以国事委于商鞅。

商鞅既已取信于秦孝公，便开始为变法张目。他首先舌战群臣，阐明治国可以不拘于一种办法，利国不必死守古训的道理，使群臣在大的原则上无法反对变法。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武官，相当于将军，秦二十等爵第十级），并且定下变法令。

接着，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在国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的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宣布谁能把它扛到北门，就赏给谁十金（二十两为一金）。围观的人都不相信这件事，没有人动，商鞅又将赏金提到五十金。这时，有一个人站出来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真的把五十金赏给了那个人，以此说明朝廷对将颁布的变法令说到做到，贯彻执行。

商鞅先公布了《垦草令》，以严厉的惩罚制度和公平的奖赏来引导秦国百姓，让他们努力生产，奋勇作战。十年之后，秦国已经道不拾遗，富裕强盛，便又进行大的体制改革。

商鞅进行改革，触动了秦国贵族的根本利益，在第一次公布的变法令中规定，爵位和俸禄要靠战功来取得。如果没有战功，即使是君王的亲戚也不得封爵位食俸禄，而立有战功的人，即使是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贵族。仅这一项，就够惊人的了，它

打破了一千多年的世袭制，使宗室贵族人人自危。而且，商鞅又推行轻罪严刑的制度，不但对平民严格地执行了，还大胆地将贵族和大臣严惩。

后来的秦惠文王作太子时，曾犯法当受刑，但因要嗣王位，不能受刑，商鞅便将他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处罚，在脸上刺了字。这件事，是促使商鞅枉死的导火索。公子虔在这之后，又曾犯法，被商鞅将鼻子割下，这使得他对商鞅恨之入骨。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孝王死，秦惠文王继位，他的老师便领着一批怨恨商鞅的贵族来告状，说商鞅欲谋反。于是秦惠文王派官吏追捕商鞅。

还在几年前，秦国的一位名叫赵良的人就已看出商鞅的这种下场了。赵良在拜见商鞅的时候，正是商鞅春风得意之时，他已被封为大良造（秦二十等爵第二等），并自己拥有商等十五座城，号为“商君”，对“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商君列传》）这一点丝毫没有戒备。商鞅见到赵良，首先邀请他帮助自己，但见他推辞，便夸自己的功绩，并问赵良自己与曾辅佐秦穆公成霸业的百里奚相比，谁更好。赵良由此发了长篇大论，劝戒商鞅，他说：

“……里百奚为秦相时，劳累了不坐车，暑天不遮盖。在国中行走，没有车马相随，没有干戈保护，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如今您见秦王，是由幸臣景监而进。而您相秦又不以百姓为重，大兴土木，并不是建功立业。将太子师傅上刑黥面，用峻刑来伤残民众，这是积怨蓄祸呀。您又南面自称寡人，整日拘束着秦国的贵族，以《诗》中‘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的话来看，这并不是想长命的办法。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而您又杀祝欢和黥公孙贾，《诗》云：‘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这几件事，并不是得人之道啊。”